

愤怒和悲伤情绪对助人决策的影响： 人际责任归因的作用

杨昭宁^{1,3} 顾子贝² 王杜娟³ 谭旭运⁴ 王晓明³

(¹ 济南大学教育与心理科学学院, 济南 250022)

(²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应用实验心理北京市重点实验室, 北京 100875)

(³ 曲阜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曲阜 273165) (⁴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北京 100732)

摘要 基于具体情绪理论——评价倾向框架理论(ATF), 采用两项研究考察负性情绪愤怒和悲伤对助人决策的影响, 并探究人际责任归因在这一关系中的作用。两项研究均采用自传体情绪记忆任务诱发情绪, 研究中一自变量情绪为组间变量, 包括愤怒、悲伤和中性三个水平, 因变量助人决策操作为他人花费时间; 研究二中自变量1为组间变量情绪, 包括愤怒和悲伤, 自变量2为组内变量人际责任归因, 操作为模糊归因、不可控的情景归因、可控的自我归因三种情境, 因变量助人决策操作为他人花费金钱。结果发现: (1)与愤怒情绪相比, 悲伤情绪下个体为他人花费的时间和捐助的金钱更多; (2)在模糊的人际责任归因条件下, 悲伤个体比愤怒个体捐助更多的钱。研究表明: 同为负性情绪的愤怒和悲伤在助人决策上的作用不同, 悲伤个体比愤怒个体做出更多的助人决策; 人际责任归因会影响附带情绪和助人决策的关系。研究结论有助于理解附带情绪对助人决策的影响, 进一步丰富并延伸 ATF 理论的证据和领域, 对发挥情境中人际责任归因在助人决策中的作用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愤怒; 悲伤; 助人决策; 人际责任归因; 附带情绪

分类号 B849: C91; B842

1 引言

理解助人决策的影响因素, 有助于实现个体做出更多助人决策、产生更多助人行为的目标(Kandrack & Lundberg, 2014)。日常生活中, 情绪体验无处不在, 许多助人决策正是我们在各种与决策任务无关的附带情绪(incidental emotion)状态下做出的。目前, 情绪影响助人决策的研究主要基于效价维度探讨积极和消极情绪与助人决策的关系(Forgas, Dunn, & Granland, 2008; Manucia, Baumann, & Cialdini, 1984), 关于具体情绪影响助人决策的研究相对较少, 而且对于同一效价内不同具体情绪是否对助人决策有相同作用的研究也甚为少见。基于此, 本研究尝试探讨同为负性效价的愤怒和悲伤两种具体情绪对助人决策的影响, 并在此基础上探

讨人际责任归因在二者关系中的边界作用。

附带情绪是预测助人决策的重要信号(Barasch, Levine, Berman, & Small, 2014), 不同效价情绪对助人决策有不同的影响。Sharma (2015)采用相关研究法, 探究大学生群体中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与亲社会行为之间的关系发现, 积极情绪与亲社会行为存在显著正相关, 消极情绪与亲社会行为呈显著负相关, 这说明积极情绪个体更有可能做出帮助他人的决策和行为(Tsai, Chen, & Liu, 2007), 消极情绪个体做出帮助他人的决策或行为的可能性更小。Lamy, Fischer-Lokou 和 Guéguen (2012)在真实情境中通过实验考察积极和消极情绪启动对助人决策的影响发现, 在“爱”的积极情绪条件下, 被试会向住院儿童捐助更多的钱, 而在“压力”的消极情绪条件下, 被试捐助的钱更少。类似地, Forgas 等人

(2008)也在真实情境采用无干扰现场实验发现,与消极情绪相比,积极情绪组提供帮助的次数更多,持续时间更长。此外,也有实验室研究发现积极情绪下个体做出的助人决策和行为显著多于消极情绪组(Manucia et al., 1984)。

近年来,有研究者开始探讨相同效价的具体情绪对不同决策的影响(Angie, Connelly, Waples, & Kligyte, 2011; Lerner & Keltner, 2000; Lerner, Li, Valdesolo, & Kassam, 2015)。例如,在职业和博弈决策中,有研究发现,悲伤个体更偏好高风险、高奖赏的决策,而焦虑个体更偏好低风险、低奖赏的决策(Raghunathan & Pham, 1999)。在风险决策中,与负性情绪恐惧相比,负性情绪愤怒下个体会更冒险(Lerner, Gonzalez, Small, & Fischhoff, 2003; Lerner & Keltner, 2001)。在经济决策中,悲伤个体和厌恶个体在禀赋效应(Endowment Effect)中存在差异,具体而言,悲伤个体会降低销售价格但会增加购买价格,表现为禀赋效应的反转,而厌恶个体则既降低销售价格也降低购买价格,表现为禀赋效应的消失(Lerner, Small, & Loewenstein, 2004)。以上这些研究都表明相同效价的具体情绪会对决策产生不同影响,我们认为相同效价的具体情绪也可能对助人决策存在不同的效应。

根据具体情绪理论——评价倾向框架(Appraisal-tendency Framework, ATF)理论,每种情绪都有其特定的认知评价维度,其中发挥主导作用的评价维度是特定情绪的核心评价主题。在诸多评价维度中,责任性(Responsibility)和控制性(Control)这两种评价维度对了解决策动因具有独特作用(Roseman, 1984),责任性指某些人或某些因素为事件结果的产生承担责任的程度;控制性指事件结果的发生由个人、他人或情境因素控制的程度(Smith & Ellsworth, 1985)。负性情绪愤怒和悲伤在责任性和控制性这两种评价维度上处于相反的两端(Smith & Ellsworth, 1985),当个体愤怒时,倾向于认为当事人对事件结果的产生是可控的,应为事件结果的产生承担责任,即愤怒在两种维度上的核心评价主题是人为责任和可控性;当个体悲伤时,倾向于认为事件结果的产生对当事人而言是不可控的,不应承担责任,其由外部情境因素所导致,即悲伤在两种维度上以情境责任和不可控为核心评价主题(Keltner, Ellsworth, & Edwards, 1993; Smith & Ellsworth, 1985; Yang & Tong, 2010)。同时,该理论也主张(Smith & Ellsworth, 1985),情绪会通过特定

情绪核心评价主题所激发的评价倾向影响个体的判断和决策(Keltner et al., 1993; Angie et al., 2011)。就愤怒和悲伤情绪与助人决策的关系而言,在责任性和控制性评价维度上,愤怒个体可能会认为事件当事人对事件结果负有责任,在当事人的努力下事件结果可控,即当事人自身原因导致了事件结果,从而做出更少的助人决策;对于同一事件,悲伤个体可能倾向于认为环境是产生当下事件结果的原因,事件的发生对当事人而言不可控,从而做出更多的助人决策(Keltner et al., 1993; Smith & Ellsworth, 1985; Yang & Tong, 2010)。鉴于此,我们认为:愤怒和悲伤两种负性情绪对助人决策可能有不同的影响,与愤怒相比,悲伤会引起更多的助人决策(假设 1)。

现有少量研究已开始关注负性情绪愤怒和悲伤对助人决策的影响。例如, Kandrack 和 Lundberg (2014)采用电影诱发任务,尝试探讨愤怒和悲伤对慈善捐助决策的作用。Small 和 Lerner (2008)采用自传体情绪记忆任务,考察愤怒和悲伤对“支持福利政策”的影响,结果发现悲伤组被试比愤怒组被试会支持援助标准更低的福利政策,以使更多的人能接受政府援助。有研究表明,决策任务情境会影响研究结果(Angie et al., 2011),据此,本研究使用与 Small 和 Lerner (2008)研究中相同的自传体情绪记忆任务诱发情绪,通过“为具体个人提供帮助”的情境,采用“为他人花费时间和金钱”两种助人决策方式,考察相同效价不同评价维度的愤怒和悲伤情绪对助人决策的影响。

就受助者自身特点而言,个体所知觉的受助者需要帮助的原因(即人际责任归因)也会影响助人决策(Applebaum, 2001; Weiner, Osborne, & Rudolph, 2011)。Weiner (1995)主张,造成当事人需要获得帮助的原因可控时(如,自身人为原因‘缺乏努力’),与不可控原因(如,外部情境原因‘身体疾病’)相比,个体提供帮助的可能性更小。Weiner 认为,与可控归因相比,进行不可控归因的个体更相信当事人对事件结果承担的责任较小,因此会提供更多的帮助。这一观点在人际支持(Weiner, 1995)和政策支持领域(Applebaum, 2001; Bullock, Williams, & Limbert, 2003)等多种情境中获得证实。例如,当个体进行不可控归因时,也就是将贫穷的归因对象知觉为情境时,其帮助穷人的意愿就会增强;而将贫穷的归因对象确定为自身人为,并进行可控归因时,个体帮助穷人的意愿就会减弱,即归因对象和控制性归因

的不同会影响助人决策。由此, 我们可以看到, 人际责任归因作用于助人决策的机制与愤怒和悲伤影响助人决策类似, 愤怒和悲伤情绪所具备的责任性和控制性评价维度存在于决策情境对对象进行的人际责任归因中。

已有启动研究表明, 当决策情境中与启动内容相关的决策对象模糊时, 潜意识的启动结构会对决策产生影响(Uleman & Bargh, 1989)。换言之, 当两种特定情绪的评价维度具有启动作用, 涉及此种评价维度的决策情境会调节情绪对决策的影响(Lerner & Keltner, 2001)。具体而言, 与评价维度相关的决策情境模糊时, 情绪对决策的影响差异最大(Gutnick, Hakimzada, Yoskowitz, & Patel, 2006; Lerner & Keltner, 2000)。当与评价维度相关的决策情境清晰时, 情绪启动结构不再影响决策, 或影响较小, 决策情境在最终决策中发挥主要作用(Solloway, Slater, Chung, & Goodall, 2013)。此外, Loersch 和 Payne (2012)指出, 归因过程可以解释情绪对判断的影响, 他们通过研究发现归因调节情绪启动对决策的影响(Feigenson & Park, 2006)。由此产生一个问题: 决策情境中对对象进行的人际责任归因是否影响愤怒和悲伤情绪与助人决策之间的关系? 对此, 我们提出假设 2: 人际责任归因是影响情绪与助人决策关系的边界条件, 与清晰的人际责任归因相比, 只有在模糊人际责任归因下, 悲伤情绪才比愤怒情绪诱发更多的助人决策。

为了验证以上两个假设, 探究愤怒和悲伤情绪对助人决策的影响, 考察人际责任归因在二者关系中的作用, 本研究进行了两个实验。实验 1 力图验证假设 1, 采用单因素(情绪)三水平被试间设计, 因变量操作为为他人提供帮助的时间。为探讨人际责任归因在情绪与助人决策关系中的边界作用, 验证假设 2, 实验 2 采用 2(情绪: 愤怒、悲伤) $\times$ 3(人际责任归因: 模糊、不可控的情景、可控的自身)的混合实验设计。总体上, 我们预期: 相同效价的愤怒和悲伤对助人决策产生不同的影响, 二者间关系受人际责任归因的影响。

2 实验 1

实验 1 的目的在于考察同为负性情绪不同评价维度的愤怒和悲伤对助人决策的影响。通过向被试提供助人决策情境, 根据被试愿意在未来为研究者提供帮助的时间操作助人决策。

2.1 方法

2.1.1 被试

在校健康大学生 90 人, 随机分配至三种情绪条件中。剔除不理解实验要求、不认真完成实验任务、怀疑实验真实性的数据, 有效数据为 85 人(女生 81 人), 平均年龄为 19.46 ± 1.20 岁。所有被试均在实验结束后接受实验礼品。

2.1.2 实验设计

实验采用单因素被试间设计, 自变量为情绪, 包括愤怒、悲伤和中性三个水平。因变量为助人决策, 操作为愿意提供帮助的时间。

2.1.3 实验材料

情绪诱发材料

采用简单、便捷, 在研究中常用的自传体情绪记忆任务诱发具体情绪(Lerner & Keltner, 2001; Small & Lerner, 2008)。情绪材料有两项题目: 第一, 要求被试描述所经历的感到悲伤的 4 件事情。第二, 要求被试详细地描述一种最感到悲伤或者曾经最悲伤的情境。两项均要求被试如实记录, 并要求被试确保他人在阅读其填写的内容时, 也能感受到相同的情绪。其中, 愤怒和中性条件材料与此相同, 区别在于愤怒条件要求被试回忆愤怒的经历, 中性条件要求被试回忆日常生活常做的事情。

情绪自我评估量表

情绪评估量表是参照前人研究自编的情绪自评量表(邱林, 郑雪, 王雁飞, 2009; Hill, DelPriore, & Vaughan, 2011; Mills & D'Mello, 2014)。采取 9 点等级评定, 要求被试在每个情绪词后选择最能表达自己情绪感受的数字, 0 = 一点都没有, 8 = 非常地强烈, 数字越大表明等级越高, 对某一情绪的感受越强。其中, 愤怒、恼火和恼怒表示愤怒情绪(Cronbach's $\alpha = 0.940$), 悲伤和难过表示悲伤情绪(Cronbach's $\alpha = 0.938$)。

助人决策情境

采用改编版的“在未来研究提供帮助”的情境测量被试的助人决策, 该情境最早在 Nelson 及其同事的研究中使用(Nelson & Norton, 2005)。实验中告知被试: 在另外一间实验室的研究者为完成毕业研究设计, 也需要其提供帮助。要求被试填写愿意提供帮助的时间(单位: 分), 0 表示不愿意提供帮助。并且, 为避免被试怀疑实验的真实性和猜测实验的目的, 实验会告知被试将会根据其个人意愿对接下来的实验进行安排。

2.2 实验程序

实验通过 Qualtrics 专业测试平台进行。被试到达实验室机房并签署知情同意书之后, 登陆 Qualtrics 在线调研平台, 严格按照指导语要求进行实验。为避免被试猜测实验意图, 在指导语中告知被试该研究内容丰富, 要依次进行 3 个独立的小研究, 研究 1 为情境记忆测验, 研究 2 为行为决策实验, 研究 3 为自我认知测验。事实上, 研究 1 为自传体情绪诱发任务, 研究 2 为助人决策情境任务, 研究 3 为情绪自我评估任务。被试完成情绪诱发任务后, 进行助人决策任务, 为避免情绪诱发效应的消退, 最后进行情绪评定。

所有实验任务完成后, 要求被试填写个人基本信息, 以及是否怀疑研究的真实性和独立性。最后, 主试向被试解释实验的真正意图, 确认实验过程中被试对研究的真实目的不知情, 并赠送被试小礼品。被试通过无偿方式招募, 其在完成实验任务之前, 并不清楚完成实验任务后会有礼品奖励。

2.3 结果

2.3.1 情绪诱发效果操作检查

对情绪诱发结果进行方差分析发现, 在愤怒等级评定上情绪间主效应显著, $F(2, 82) = 12.44, p < 0.01, \eta_p^2 = 0.23$; 悲伤评分结果上情绪间主效应显著, $F(2, 82) = 42.51, p < 0.01, \eta_p^2 = 0.51$ 。事后多重比较发现, 愤怒组被试自我报告的愤怒等级评分显著高于悲伤组($MD = 2.23, SD = 0.57$)和中性组($MD = 2.63, SD = 0.56$), $ps < 0.01$; 悲伤组被试自我报告的悲伤等级评分显著高于愤怒组($MD = 2.52, SD = 0.53$)和中性组($MD = 4.72, SD = 0.51$), $ps < 0.01$ 。这表明情绪诱发有效。

2.3.2 助人决策

不同情绪下年龄差异不显著, $F(2, 82) = 1.32, p = 0.27$ 。年龄变量不再纳入后续统计分析。

对被试在助人决策中愿意提供帮助的时间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发现, 情绪的主效应显著, $F(2, 82) = 8.63, p < 0.01, \eta_p^2 = 0.17$ 。事后多重比较表明, 悲伤组被试愿意提供帮助的时间($M = 39.24, SD = 3.49$)显著多于愤怒组($M = 24.23, SD = 2.62$)和中性组($M = 31.50, SD = 2.44$), $p_1 < 0.01, p_2 < 0.05$; 愤怒组被试愿意提供的帮助显著少于中性组, $p = 0.046$ (结果见图 1)。

2.4 讨论

实验 1 采用为他人花费时间作为助人决策任务探究具体情绪对助人决策的影响。结果发现: 与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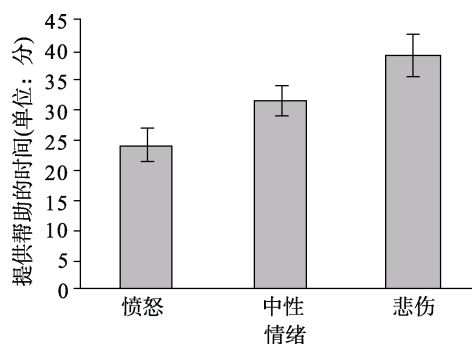


图 1 三种情绪下被试愿意提供帮助的时间(注: 误差线表示标准误)

怒和中性组相比, 悲伤情绪下个体会提供更多的时间帮助另一位研究者; 与中性组相比, 愤怒情绪下个体会提供更少的时间帮助另一位研究者。这表明, 负性情绪愤怒和悲伤对助人决策有不同影响, 假设 1 得到证实。

研究中愤怒和悲伤影响助人决策的结果表明相同效价的具体情绪对助人决策有不同的影响, 这与 ATF 理论所主张的情绪主要通过核心评价主题影响决策的观点相一致(Lerner & Keltner, 2000, 2001), 具有不同责任性和控制性评价维度的愤怒和悲伤对助人决策的影响不同。就本研究而言, 愤怒情绪下的个体可能更倾向于对“研究者需要帮助”进行“这是研究者自己的事情, 与我无关, 即便我不提供帮助, 研究者也可以通过向别人寻求帮助来解决问题”的人际责任归因, 从而愿意提供帮助的时间会更少; 而悲伤个体或许更倾向于对“研究者需要帮助”进行“研究者想顺利完成毕业设计, 的确不是一己之力就足够, 确实需要外界我们的参与才能顺利完成实验”的人际责任归因, 从而愿意提供帮助的时间更多。为进一步论证以上这一解释, 鉴于愤怒和悲伤情绪所具备的责任性和控制性评价主题存在于决策情境对对象进行的人际责任归因中, 根据 Uleman 和 Bargh (1989) 关于启动情绪影响决策的观点, 考察决策情境中人际责任归因的作用为进一步探究愤怒和悲伤情绪对助人决策的影响提供了思路。

此外, 以时间和金钱为成本的利他是两种最主要的亲社会类型(李继波, 黄希庭, 2014; Cnaan, Jones, Dickin, & Salomon, 2010; Gino & Mogilner, 2014), 个体对作为价值的时间和金钱进行决策时具有不同的认知加工和决策行为(张军伟, 徐富明, 刘腾飞, 陈雪玲, 蒋多, 2010)。在实验 1 中我们采用为他人花费时间的助人决策情境, 那么, 愤怒和悲伤情绪

对作为价值的金钱花费的影响如何? 因此, 实验 2 采用为他人花费金钱的助人决策情境, 对决策对象进行人际责任归因, 进一步探究愤怒和悲伤与助人决策的关系。

3 实验 2

实验 2 通过为他人花费金钱操纵助人决策, 设置人际责任归因情境考察人际责任归因对情绪与助人决策关系的影响, 进一步证实并延伸实验 1 结果。

3.1 方法

3.1.1 被试

在校健康大学生 75 人, 随机分配至两种情绪条件中。剔除不理解实验要求、不认真完成实验任务、怀疑实验真实性的数据, 有效数据为 70 人(女生 53 人), 平均年龄为 19.32 ± 0.63 岁。所有被试均在实验结束后接受实验礼品。

3.1.2 实验设计

实验为 2(情绪: 愤怒、悲伤) $\times$ 3(人际责任归因: 模糊、不可控的情景、可控的自我)的混合实验设计。情绪为组间变量, 人际责任归因为组内变量。因变量操作为为他人花费金钱的助人决策。

3.1.3 实验材料

情绪诱发材料和情绪评定量表同实验 1。

助人决策情境: 改编 Small 和 Lerner (2008) 研究中受助对象的一般情况作为助人情境材料, 但要求被试完成不同的助人决策。首先, 告知被试慈善捐助活动中受助对象的一般情况, 最后, 要求被试回答在 100 元人民币范围内会向该受助对象捐助多少钱, 100 元这一范围根据个体日常每次捐款在平均数 50 元上下浮动而制定。

人际责任归因情境: 人际责任归因情境用于说明助人决策情境中受助对象的一般情况。参照 Weiner 等人(2011)总结的导致个体贫穷需要帮助的原因, 采用彭小凡、谢德光和张大均(2013)、张爱卿和刘华山(2002)在研究中编制归因情境的方法, 根据归因模糊程度、归因对象和控制性把人际责任归因分为三种: 模糊归因、不可控的情景归因、可控的自我归因, 后两种属于归因不模糊情境。模糊归因没有清晰说明助人情境中受助对象需要帮助原因的归因对象和控制性; 不可控的情景归因指出受助对象需要帮助的主要原因是外部环境因素, 受助者无法通过努力改变需要被帮助的结果, 受助者对这一原因不可控; 可控的自我归因指出受助对象

需要帮助的主要原因是自身不努力, 受助者完全可以通过个人努力改变需要被帮助这一事实, 受助者对这一原因可控。三种情境的具体操作如下: 模糊归因情境只说明某对象是受助对象; 不可控情景归因情境中, 除了有模糊情境中的信息, 还说明受助者需要帮助的原因是父亲生病需要照顾, 其在工作中虽然努力并被认可, 但不得不在家照顾无人照看的父亲; 可控的自我归因情境中, 首先呈现模糊情境中的信息, 然后说明受助者需要帮助的原因是自己好吃懒做、不努力, 在受助者努力的情况下完全可以改变贫穷, 但是其并没有付出努力。

3.2 实验程序

3.2.1 人际责任归因情境操纵

为避免正式实验中无法有效区分人际责任归因是归因情境还是情绪影响的结果(Cassese & Weber, 2011), 我们招募 26 名大学生提前进行人际责任归因操纵有效性测量。实验采用被试内设计, 被试均完成三种人际责任归因情境, 为避免后两种情境对模糊情境的影响, 所有被试均首先完成模糊情境, 后两种情境进行顺序平衡。采用 11 点两极量尺测量人际责任归因, 有两个指标: 一是归因对象指标, 用于说明受助者贫穷和需要帮助的原因, 1 = 完全是自身人为原因, 11 = 完全是情境原因, 等级越高表明受助者需要接受捐助的原因越可能是情境原因; 二是控制性指标, 说明受助者对造成其需要帮助的原因的控制程度, 1 = 对于造成该受助者需要帮助的原因受助者完全可以控制, 11 = 受助者完全不能控制, 等级越高表示不可控程度越大。在阅读以上一种情境后, 完成 11 点量尺测量, 然后依次完成其它两种情境。在正式实验中, 被试阅读人际责任归因情境后不再进行操作性检查。

结合情绪与归因的紧密关系(Major, 2011; Quigley & Tedeschi, 1996; Weiner, 1980), 为说明实验 2 与实验 1 研究的具体情绪相同, 我们招募 34 名被试, 对模糊人际责任归因情境下愤怒和悲伤的结果进行检验。实验采用被试内设计, 所有被试在阅读模糊人际责任归因情境后报告目前的愤怒和悲伤情绪感受, 采用 11 点等级评定, 1 = 一点都没有, 11 = 非常地强烈, 数字越大表明情绪感受性越强。为结合模糊人际责任归因情境下具体情绪愤怒和悲伤对助人决策的影响, 更好地说明实验 2 和实验 1 中研究的具体情绪相同, 在助人决策结果后报告该结果。此外, 我们也同时对两种清晰人际责任归因情境下愤怒和悲伤的结果进行检验, 该结果有助于解

释人际责任归因影响情绪与助人决策关系的机制。

3.2.2 正式实验

实验程序类似实验 1。区别是：指导语要求被试完成两个独立的研究，研究 1 为情境记忆测验，研究 2 为行为决策实验。被试完成情绪诱发任务后，阅读包含人际责任归因情境的助人决策材料，最后完成捐钱的助人决策任务。与实验 1 相比，由于助人决策情境中的人际责任归因可能会作用于个体情绪，情绪评定结果并不完全是情绪诱发的结果，实验 2 没有在决策任务结束后进行情绪诱发的操作性检查。

3.3 结果

3.3.1 人际责任归因有效性检验

对被试在归因对象上的评分进行人际责任归因情境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发现，人际责任归因情境主效应显著， $F(2, 50) = 129.41, p < 0.01, \eta_p^2 = 0.84$ 。事后多重比较发现，模糊归因情境中评分显著高于可控的自我归因情境($MD = 2.04, SD = 0.31$)，但显著低于不可控的情景归因情境($MD = -4.81, SD = 0.56$)；不可控情景归因情境下评分显著低于可控的自我归因情境($MD = -6.85, SD = 0.40$)， $ps < 0.01$ 。结果表明人际责任归因情境就归因对象而言操纵有效。

对被试在控制性上的评分进行人际责任归因情境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发现，人际责任归因情境主效应显著， $F(2, 50) = 102.31, p < 0.01, \eta_p^2 = 0.80$ 。事后多重比较发现，模糊归因情境中评分显著高于可控的自我归因情境($MD = 1.77, SD = 0.30$)，但显著低于不可控情景归因情境($MD = -4.50, SD = 0.57$)；不可控情景归因情境下评分显著低于可控的自我归因情境($MD = -6.27, SD = 0.45$)， $ps < 0.01$ 。结果表明人际责任归因情境就控制性而言操纵有效。

以上结果表明，人际责任归因情境在归因对象和控制性两个方面操纵有效。

3.3.2 助人决策

不同情绪下的年龄差异不显著， $t(67) = -1.09, p = 0.28$ ；助人决策中愿意捐赠的金钱数额在性别上不存在显著差异， $F(1, 67) = 1.85, p = 0.18$ ，这表明年龄和性别对助人决策不存在影响，因此，年龄和性别变量均不纳入后续统计分析。

对被试捐赠的金钱数额进行 2(情绪：愤怒、悲伤)×3(人际责任归因：模糊、不可控的情景归因、可控的自我归因)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发现，情绪间的主效应显著， $F(1, 68) = 13.89, p < 0.01, \eta_p^2 =$

0.17，悲伤组被试捐赠的金钱数额($M = 35.42, SD = 2.78$)显著多于愤怒组($M = 20.76, SD = 2.78$)。人际责任归因的主效应显著， $F(2, 136) = 138.68, p < 0.01, \eta_p^2 = 0.67$ ，事后多重比较发现，不可控情景归因组被试捐赠的金钱数额($M = 58.43, SD = 3.49$)显著多于模糊组($M = 21.46, SD = 2.94$)、可控的自我归因组($M = 4.39, SD = 1.34$)，模糊组被试捐赠的金钱数额显著多于可控的自我归因组($MD = 17.07, SD = 2.64$)， $ps < 0.01$ 。两自变量间的交互作用显著， $F(2, 136) = 6.04, p < 0.01, \eta_p^2 = 0.08$ (结果见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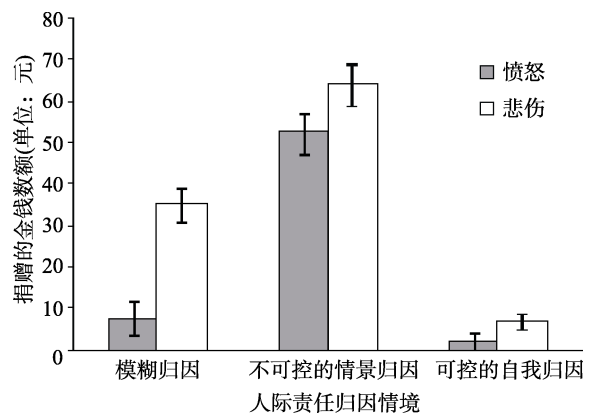


图 2 愤怒和悲伤情绪在不同人际责任归因情境下捐赠的金钱数额(注：误差线表示标准误)

进一步简单效应分析发现，模糊归因组被试在不同情绪条件下捐赠的金钱数额存在显著差异， $F(1, 68) = 21.69, p < 0.01, \eta_p^2 = 0.24$ ，悲伤组捐赠的金钱数额显著多于愤怒组($MD = 27.37, SD = 5.88$)。在不可控情景归因组 [$F(1, 68) = 2.82, p > 0.05$]、可控的自我归因组 [$F(1, 68) = 3.30, p > 0.05$]，被试捐赠的金钱数额均不受情绪的影响。

在愤怒情绪条件下，不同人际责任归因情境下被试捐赠的金钱数额存在显著差异， $F(2, 67) = 51.80, p < 0.01, \eta_p^2 = 0.61$ ；不可控情景归因组被试捐赠的金钱数额($M = 52.57, SD = 4.94$)显著多于模糊组($M = 7.77, SD = 4.16$)、可控的自我归因组($M = 1.94, SD = 1.89$)， $ps < 0.01$ ，模糊组、可控的自我归因组被试捐赠的金钱数额不存在显著差异， $p > 0.05$ 。在悲伤情绪下，人际责任归因情境影响捐赠金钱的数额， $F(2, 67) = 73.01, p < 0.01, \eta_p^2 = 0.69$ ；不可控情景归因组被试捐赠的金钱数额($M = 64.29, SD = 4.94$)显著多于模糊组($M = 35.14, SD = 4.16$)、可控的自我归因组($M = 6.83, SD = 1.89$)，模糊归因组显著多于可控的自我归因组($MD = 28.31, SD = 3.73$)， $all ps < 0.01$ 。

此外, 对被试在模糊人际责任归因条件下愤怒和悲伤的结果进行配对样本 t 检验发现, 愤怒和悲伤情绪结果不存在显著差异, $t(33) = 0.96, p = 0.346$ 。这表明模糊人际责任归因情境没有明显的诱发情绪, 结合模糊人际责任归因情境下愤怒和悲伤对助人决策的影响, 说明模糊人际责任归因情境下的助人决策是附带情绪的结果, 这与实验 1 中所研究的具体情绪对助人决策的作用相同。

对被试在两种清晰人际责任归因条件下愤怒的结果、悲伤的结果进行配对样本 t 检验发现, 愤怒结果存在显著差异, $t(33) = 7.08, p < 0.01$, Cohen's $d = 1.66$, 可控自我归因组的愤怒($M = 8.21, SD = 2.59$)显著高于不可控情景归因组($M = 3.94, SD = 2.55$); 悲伤结果存在边缘显著, $t(33) = -1.91, p = 0.065$, Cohen's $d = 0.48$, 可控自我归因组的悲伤($M = 6.32, SD = 3.48$)显著低于不可控情景归因组($M = 7.68, SD = 2.01$)。结合两种清晰人际责任归因条件下愤怒和悲伤对助人决策的影响, 这表明两种清晰的人际责任归因条件可能通过分别产生的愤怒和悲伤情绪与附带的愤怒和悲伤情绪共同作用于最终的助人决策。

鉴于清晰人际责任归因情境中的助人决策反映了两类情绪(个体附带情绪和归因情境诱发情绪)的共同作用, 而人际责任归因模糊情境中的助人决策, 因为没有明显的归因诱发的情绪, 则更可能反映了附带情绪的作用。据此, 人际责任归因清晰与模糊情境中助人决策结果的差值则突出了归因情境诱发的情绪的效应。为进一步说明清晰的人际责任归因通过诱发情绪影响了附带情绪与助人决策的关系, 以情绪为组间变量, 以归因情境诱发的情绪(不可控情景归因组和可控自我归因组与模糊情景下助人决策结果的差值)为组内变量, 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发现, 归因情境诱发的情绪的主效应显著, $F(1, 68) = 232.27, p < 0.001, \eta_p^2 = 0.774$, 不可控情景归因 - 模糊归因下的助人决策显著多于可控的自我归因 - 模糊归因($MD = 54.04, SD = 3.55$)。情绪和归因情境诱发情绪的交互作用不显著, $F(1, 68) = 0.93, p = 0.339$ 。这表明, 人际责任归因清晰情境诱发的愤怒和悲伤情绪对助人决策的影响在两种附带情绪愤怒和悲伤中均存在。

3.4 讨论

实验 2 证实假设 2: 当人际责任归因模糊时, 个体无法明确受助者需要帮助的原因是否自身所致、是否可控, 与悲伤情绪相比, 愤怒情绪下个体会为

受助者捐助更少的钱; 当人际责任归因情境清晰时, 不论受助者需要帮助的原因是情景还是自身人为所致、是可控还是不可控, 愤怒组和悲伤组所捐助的金钱数额均不存在显著差异。这表明, 当人际责任归因模糊时, 愤怒和悲伤情绪会影响助人决策; 当人际责任归因清晰时, 个体的助人决策主要受人际责任归因情境的影响。

实验 2 进一步证实并延伸了实验 1 的结果, 愤怒和悲伤情绪对助人决策的影响不仅存在于以时间为价值的决策情境, 也存在于以金钱为价值的决策情境。同时, 这种效应的存在是有条件的, 只有决策情境中对象的人际责任归因模糊时, 才会存在情绪影响助人决策的效应。此外, 我们意外发现: 人际责任归因影响情绪与助人决策关系的机制可能是由人际责任归因引起的愤怒和悲伤与附带情绪的共同作用。

4 总讨论

本研究尝试通过两项实验探究相同效价的具体情绪与助人决策的关系及其人际责任归因的边界作用。实验 1 考察为他人花费时间的助人决策, 实验 2 考察为他人花费金钱的助人决策, 两项实验均探究同为负性情绪的愤怒和悲伤对助人决策的影响。结果表明, 负性情绪愤怒和悲伤对“为具体个人提供帮助”的助人决策有不同影响, 与愤怒情绪相比, 悲伤情绪下的个体会做出更多的助人决策。并且, 人际责任归因调节了情绪与助人决策间的关系, 只有人际责任归因模糊时, 相同效价的具体情绪才会产生不同的助人决策。

同为负性情绪的愤怒和悲伤情绪对助人决策有不同的影响, 与愤怒情绪相比, 悲伤情绪下的个体会做出更多的助人决策。实验 1 将助人决策操纵为为他人花费时间, 实验 2 将助人决策操纵为为他人花费金钱, 两项以“为具体个人提供帮助”的助人情境实验均证明了以上结论。该结论与 Small 和 Lerner (2008)进行的情绪与“支持福利政策”的关系的研究结果相一致。愤怒个体更倾向于将助人决策任务中受助者需要帮助的原因归因为受助者自己造成, 通过受助者自己的努力, 贫穷的结果在受助者控制范围内, 所以, 愤怒组被试愿意提供帮助的时间和捐助的钱更少。相反, 悲伤情绪的个体更倾向于将原因归因为外部情境因素, 贫穷结果不在受助者控制范围内, 与受助者是否努力关系不大, 所以, 悲伤组被试提供帮助的时间和捐助的钱更多。

研究结果与 Kandrack 和 Lundberg (2014)在研究中发现的悲伤情绪的作用一致,与愤怒情绪的作用不同,原因可能在于他们没有有效诱发愤怒情绪,因此愤怒对慈善捐助决策的影响没有发生。根据以上分析,我们认为相同效价的具体情绪会产生不同的助人决策结果。此外,实验 1 发现悲伤组个体比中性组个体愿意提供帮助的时间更多,这似乎与前人所发现的消极情绪与亲社会行为的负相关关系相违背,其实不然。Sharma (2015)采用 PANAS 量表中的 NA 分量表来测量消极情绪,这些测量项目主要涵盖愤怒、耻辱、憎恶、负疚和紧张等情绪(张卫东,刁静, Schick, 2004; Watson, Clark, & Tellegen, 1988),且这些情绪在对决策动因具有独特作用的责任性和控制性两种评价维度上均不同于悲伤(Smith & Ellsworth, 1985)。因此,实验 1 与 Sharma (2015)结果的不同间接说明不同负性情绪对亲社会行为具有不同的预测作用。当然,本研究仅考察同为负性情绪的愤怒和悲伤两种情绪,同为负性情绪的其它具体情绪与助人决策的关系如何,积极情绪中不同具体情绪如何影响助人决策均需要进一步研究。

人际责任归因影响情绪与助人决策的关系,当人际责任归因情境模糊时,愤怒和悲伤情绪会产生不同的助人决策。这与 Uleman 和 Bargh (1989)的观点一致,由于愤怒和悲伤情绪所具备的责任性和控制性存在于决策情境对对象进行的人际责任归因中,个体进行人际责任归因的对象在启动结构上模糊时,在具有不同启动结构的情绪中模糊的人际责任归因由此会成为可能具有不同解释的“墨迹”(Darley & Gross, 1983),即愤怒情绪对模糊的人际责任归因进行自身人为和可控解释,悲伤情绪使个体对模糊的人际责任归因进行外部情境和不可控解释,从而最终作用于助人决策。但是,当人际责任归因在启动结构上清晰时,在责任性和控制性上不同的愤怒和悲伤情绪可能不会对助人决策产生不同的影响或者说影响极小,具备清晰归因对象和控制性的人际责任归因在助人决策中发挥主要作用。这一结果强调了具有不同评价维度的相同效价的具体情绪与助人决策的独特关系,论证了助人决策任务中的人际责任归因情境会调节具体情绪与助人决策的关系,进一步证实 ATF 理论。此外,根据不同人际责任归因情境下愤怒和悲伤情绪的结果,人际责任归因对情绪与助人决策关系的影响,以及清晰人际责任归因情境诱发的情绪对助人决

策的影响,本研究意外发现人际责任归因影响情绪与助人决策关系的机制可能在于:个体在对事件结果做出归因后,会产生某种情绪,这会影响个体原有的附带情绪(Winterich, Han, & Lerner, 2010),最后共同作用于助人决策。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这也意味着实验 2 中被试情绪的来源有二:一个是个体的附带情绪,另一个是清晰的人际责任归因情境所诱发的情绪,虽然我们认为这并不影响研究的结论和意义,但是在未来研究中仍应试图对以上两个来源进行分离或平衡。也有研究认为,具体情绪通过影响个体对事件的归因而产生行为(Wagner, 2014),因此具体情绪可能影响归因,然后与人际责任归因相互作用,最后影响助人决策。对于后一种解释的合理性和适用性在本研究无法得到直接验证,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总之,本研究通过探讨愤怒和悲伤情绪对助人决策的影响及人际责任归因在二者关系中的作用,加深了相同效价不同具体情绪影响助人决策的理解,丰富了 ATF 的研究领域和证据。同时,研究结果为进行现实助人决策的准确预测提供了依据,有助于了解何种条件情绪发挥主要作用,何种条件人际责任归因情境发挥主要作用,如何在不了解个体情绪状态情况下更好地操纵人际责任归因以增加助人决策。

但是,本研究仍然有一些不足之处,未来可从以下四方面进一步推进助人决策、情绪与助人决策关系的研究。第一,本研究关注实验室情境下诱发的附带情绪,未来研究可通过现场实验关注真实情境,探讨与当前助人决策相关的直接情绪与助人决策的关系。第二,本研究并没有对比作用于助人决策的愤怒和悲伤情绪是否存在强度差异, Keltner 等人(1993)在研究中发现,不同强度的愤怒和悲伤、不同强度的愤怒情绪、不同强度的悲伤情绪均会对个体不同的社会知觉产生不同的影响。因此,在未来研究中,可以探讨不同强度的具体情绪对助人决策的影响。并且,根据前人研究,为诱发不同强度的具体情绪,可以采用不同的情绪诱发方法来操纵(Keltner et al., 1993)。第三,由于客观原因,本研究样本性别比例比较极端,一方面我们认为本研究的目的是探究愤怒和悲伤两种具体的负性情绪对助人决策的影响,助人决策的性别差异不作为研究重点。虽然男生极少,但在女生较多的情况下依然发现了愤怒和悲伤对助人决策的不同作用,因此这种样本选择可能并不足以成为推翻研究结果的条件。

但另一方面, 性别的确是影响亲社会行为的一个有趣且重要的变量(Diekman & Clark, 2015), 未来研究可以探讨在不同助人决策情境中的性别差异和性别相似性。

5 结论

本研究通过考察愤怒和悲伤情绪对助人决策的影响, 采用为他人花费时间和为他人花费金钱两种助人决策任务, 得出以下结论:

(1)愤怒和悲伤情绪影响助人决策, 悲伤比愤怒增加个体的助人决策, 相同效价不同具体情绪对助人决策的影响不同;

(2)人际责任归因影响情绪与助人决策之间的关系, 其是具体情绪影响助人决策的边界条件, 只有在模糊的人际责任归因下, 悲伤个体才比愤怒个体做出更多的助人决策。

参 考 文 献

- Angie, A. D., Connelly, S., Waples, E. P., & Kligyte, V. (2011). The influence of discrete emotions on judgement and decision-making: A meta-analytic review. *Cognition and Emotion*, 25(8), 1393-1422.
- Applebaum, L. D. (2001). The influence of perceived deservingness on policy decisions regarding aid to the poor. *Political Psychology*, 22(3), 419-442.
- Barasch, A., Levine, E. E., Berman, J. Z., & Small, D. A. (2014). Selfish or selfless? On the signal value of emotion in altruistic behavior.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7(3), 393-413.
- Bullock, H. E., Williams, W. R., & Limbert, W. M. (2003). Predicting support for welfare policies: The impact of attributions and beliefs about inequality. *Journal of Poverty*, 7(3), 35-56.
- Cassese, E., & Weber, C. (2011). Emotion, attribution, and attitudes toward crime. *Journal of Integrated Social Sciences*, 2(1), 63-97.
- Cnaan, R. A., Jones, K., Dickin, A., & Salomon, M. (2011). Nonprofit watchdogs: Do they serve the average donor? *Nonprofit Management and Leadership*, 21, 381-397.
- Darley, J. M., & Gross, P. H. (1983). A hypothesis-confirming bias in labeling effect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44(1), 20-33.
- Diekman, A. B., & Clark, E. K. (2015). Beyond the damsel in distress: Gender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in enacting prosocial behavior. In D. A. Schroeder & W. G. Graziano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rosocial behavior* (pp. 376-391).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Feigenson, N., & Park, J. (2006). Emotions and attributions of legal responsibility and blame: A research review. *Law and Human Behavior*, 30(2), 143-161.
- Forgas, J. P., Dunn, E., & Granland, S. (2008). Are you being served...? An unobtrusive experiment of affective influences on helping in a department store.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38(2), 333-342.
- Gino, F., & Mogilner, C. (2014). Time, money, and morality. *Psychological Science*, 25(2), 414-421.
- Gutnik, L. A., Hakimzada, A. F., Yoskowitz, N. A., & Patel, V. L. (2006). The role of emotion in decision-making: A cognitive neuroeconomic approach towards understanding sexual risk behavior. *Journal of Biomedical Informatics*, 39(6), 720-736.
- Hill, S. E., DelPriore, D. J., & Vaughan, P. W. (2011). The cognitive consequences of envy: Attention, memory, and self-regulatory deple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1(4), 653-666.
- Kandrack, R., & Lundberg, G. (2014). On the influence of emotion on decision making: The case of charitable giving. In P. J. Guo & W. Pedrycz (Eds.), *Human-centric decision-making models for social sciences* (pp. 57-73). Berlin Heidelberg: Springer.
- Keltner, D., Ellsworth, P. C., & Edwards, K. (1993). Beyond simple pessimism: Effects of sadness and anger on social percep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64(5), 740-752.
- Lamy, L., Fischer-Lokou, J., & Guéguen, N. (2012). Priming emotion concepts and helping behavior: How unlivid emotions can influence action. *Social Behavior and Personality: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40(1), 55-61.
- Lerner, J. S., Gonzalez, R. M., Small, D. A., & Fischhoff, B. (2003). Effects of fear and anger on perceived risks of terrorism a national field experiment. *Psychological Science*, 14(2), 144-150.
- Lerner, J. S., & Keltner, D. (2000). Beyond valence: Toward a model of emotion-specific influences on judgement and choice. *Cognition and Emotion*, 14(4), 473-493.
- Lerner, J. S., & Keltner, D. (2001). Fear, anger, and risk.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1(1), 146-159.
- Lerner, J. S., Li, Y., Valdesolo, P., & Kassam, K. S. (2015). Emotion and decision making.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66, 799-823.
- Lerner, J. S., Small, D. A., & Loewenstein, G. (2004). Heart strings and purse strings. Carryover effects of emotions on economic decisions. *Psychological Science*, 15(5), 337-341.
- Li, J. B., & Huang, X. T. (2014). The effects of accounting for time on prosocial behaviors. *Psychological Science*, 37(4), 925-929.
- [李继波, 黄希庭. (2014). 时间定价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 *心理科学*, 37(4), 925-929.]
- Loersch, C., & Payne, B. K. (2012). On mental contamination: The role of (mis)attribution in behavior priming. *Social Cognition*, 30(2), 241-252.
- Major, L. H. (2011). The mediating role of emotions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rames and attribution of responsibility for health problems.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88(3), 502-522.
- Manucia, G. K., Baumann, D. J., & Cialdini, R. B. (1984). Mood influences on helping: Direct effects or side effect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46(2), 357-364.
- Mills, C., & D'Mello, S. (2014). On the validity of the autobiographical emotional memory task for emotion induction. *PLoS One*, 9(4), e95837.
- Nelson, L. D., & Norton, M. I. (2005). From student to superhero: Situational primes shape future helping.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41(4), 423-430.
- Peng, X. F., Xie, D. G., & Zhang D. J. (2013). The spotlight effect of anger: How the incidental anger influence our judgment on the social news report.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Education*, 29(6), 578-587.

- [彭小凡, 谢德光, 张大均. (2013). 愤怒的聚光灯效应对个体新闻阅读的归因影响. *心理发展与教育*, 29(6), 578–587.]
- Qiu, L., Zheng, X., & Wang, Y. F. (2009). Revision of the positive affect and negative affect scale. *Chinese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14(3), 249–254.
- [邱林, 郑雪, 王雁飞. (2009). 积极情感消极情感量表(PANAS)的修订. *应用心理学*, 14(3), 249–254.]
- Quigley, B. M., & Tedeschi, J. T. (1996). Mediating effects of blame attributions on feelings of anger.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22(12), 1280–1288.
- Raghunathan, R., & Pham, M. T. (1999). All negative moods are not equal: Motivational influences of anxiety and sadness on decision making.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79(1), 56–77.
- Roseman, I. (1984). Cognitive determinants of emotions: A structural theory. In P. Shaver (Ed.), *Review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 5. Emotions, relationships, and health* (pp. 11–36). Beverly Hills: Sage.
- Sharma, P. (2015). Positive and negative affect: Impact on empathy and prosocial behaviour among college going adolescents.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ian Psychology*, 2(3), 12–17.
- Small, D. A., & Lerner, J. S. (2008). Emotional policy: Personal sadness and anger shape judgments about a welfare case. *Political Psychology*, 29(2), 149–168.
- Smith, C. A., & Ellsworth, P. C. (1985). Patterns of cognitive appraisal in emo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48(4), 813–838.
- Solloway, T., Slater, M. D., Chung, A., & Goodall, C. E. (2013). Anger, sadness, and fear responses to crime and accident news stories: How emotions influence alcohol-control policies support via risk concern. *Journal of Media Psychology*, 25(4), 160–170.
- Tsai, W. C., Chen, C. C., & Liu, H. L. (2007). Test of a model linking employee positive moods and task performance.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92(6), 1570–1583.
- Uleman, J. S., & Bargh, J. A. (1989). *Unintended thought*. New York: Guilford.
- Wagner, M. (2014). Fear and anger in great britain: Blame assignment and emotional reactions to the financial crisis. *Political Behavior*, 36(3), 683–703.
- Watson, D., Clark, L. A., & Tellegen, A. (1988).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brief measures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affect: The PANAS scal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4(6), 1063–1070.
- Weiner, B. (1980). A cognitive (attribution)-emotion-action model of motivated behavior: An analysis of judgments of help-giving.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39(2), 186–200.
- Weiner, B. (1995). *Judgments of responsibility: A foundation for a theory of social conduct*. New York: Guilford.
- Weiner, B., Osborne, D., & Rudolph, U. (2011). An attributional analysis of reactions to poverty: The political ideology of the giver and the perceived morality of the receiver.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15(2), 199–213.
- Winterich, K. P., Han, S., & Lerner, J. S. (2010). Now that I'm sad, it's hard to be mad: The role of cognitive appraisals in emotional blunting.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36(11), 1467–1483.
- Yang, Z. X., & Tong, E. M. W. (2010). The effects of subliminal anger and sadness primes on agency appraisals. *Emotion*, 10(6), 915–922.
- Zhang, A. Q., & Liu, H. S. (2002). The interpersonal attribution of responsibility and the will of helping.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Education*, (4), 1–5.
- [张爱卿, 刘华山. (2002). 人际责任归因与助人意愿的关系. *心理发展与教育*, (4), 1–5.]
- Zhang, J. W., Xu, F. M., Liu, T. F., Chen, X. L., & Jiang, D. (2010). Time as value in behavioral decision making: A comparison between time and money. *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8(10), 1574–1579.
- [张军伟, 徐富明, 刘腾飞, 陈雪玲, 蒋多. (2010). 行为决策中作为价值的时间: 基于与金钱的比较. *心理科学进展*, 18(10), 1574–1579.]
- Zhang, W. D., Diao, J., & Schick, C. J. (2004). The cross-cultural measurement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affect examining the dimensionality of PANAS. *Psychological Science*, 27(1), 77–79.
- [张卫东, 刁静, Schick, C. J. (2004). 正、负性情绪的跨文化心理测量: PANAS 维度结构检验. *心理科学*, 27(1), 77–79.]

The effect of anger and sadness on prosocial decision making: The role of the interpersonal attribution of responsibility

YANG Zhaoning^{1,3}; GU Zibei²; WANG Dajuan³; TAN Xuyun⁴; WANG Xiaoming³

(¹ School of Education and Psychology, University of Jinan, Jinan 250022, China) (² School of Psycholog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Key Lab of Applied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Beijing 100875, China)

(³ School of Education Science, Qufu Normal University, Qufu 273165, China)

(⁴ Institute of Soci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Abstract

Previous research suggested that emotions have an effect on prosocial decision making depending on the dimensions of emotional valence, little research has verified the role of specific emotions of the same valence. Drawing on the Appraisal-Tendency Framework (ATF), the present set of studies aimed to explore the carryover effect of two incidentally negative emotions, i.e. anger and sadness, on prosocial decision making and the role of the interpersonal attribution of responsibility in this effect.

We conducted two studies, where emotions were induced via the Autobiographical Emotional Memory Task

(AEMT). Study 1 investigated the effects of anger and sadness on prosocial decision making with a between-subjects design. Participants were randomly assigned to angry, sad, or neutral conditions and were asked to indicate how much time they were willing to spend helping others. Study 2 explored whether the effects of anger and sadness on prosocial decision making depend on interpersonal attribution of responsibility. This study employed a 2 (emotions: anger/ sadness) $\times$ 3 (interpersonal attribution of responsibility: ambiguity/ uncontrollable and external situation/ controllable situation and recipient own) mixed design with emotions as a between-subjects variable. Participants were randomly assigned to angry or sad conditions. Similar to study 1, emotions were induced through AEMT. Interpersonal attribution of responsibility was manipulated by varying the information about the person who needs help. In the ambiguity condition, the reason that the person needs help is not clear; in the uncontrollable and external situation condition, the reason that the person needs help is due to uncontrollable external situation; in the controllable situation and recipient own condition, the person who is in need of help is responsible for such circumstance. Prosocial decision making was measured by the amount of money participants were willing to donate.

Across two studies we found that: (1) Participants in the sad condition were willing to spend more time and donate more money to others than their counterparts in the angry and neutral conditions. (2) Under the condition of ambiguous attribution of responsibility, participants who experienced sadness were more willing to help others compared to those in angry condition; in the uncontrollable and external situation conditions, and controllable situation and recipient own conditions, anger and sadness had similar effects on helping behavior. (3) In the sad condition, compared to ambiguous attribution of responsibility, participants were more willing to help when the responsibility was attributed to uncontrollable and external situation, whereas participants were less willing to help when the responsibility was attributed to the person who needs help. In the angry condition, participants were more willing to help when the responsibility was attributed to uncontrollable and external situation rather than when it was ambiguous or when the recipients were blamed.

We conclude that (a) Incidental emotions of the same valence have different effects of carrying over on prosocial decision making- sadness facilitates helping behavior while anger impedes prosocial decision making, and (b) Interpersonal attribution of responsibility contributes to such effect. Anger and sadness have opposing effects on prosocial decision making only when the interpersonal attribution of responsibility remains ambiguous. These findings have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understanding the mechanism underlying the impacts of different incidental emotions of the same valence on prosocial decision making.

Key words anger; sadness; prosocial decision making; interpersonal attribution of responsibility; incidental emotions